

诗溢扬子江 情满小康路

——第三届扬子江诗会系列活动综述

一年一度的扬子江诗会是江苏省作协倾力打造的扬子江系列文学品牌活动之一，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举办了大家讲坛、新世纪20年中国诗歌创作研讨会、“情满小康路”诗歌朗诵会等三场活动。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站在这样一个历史交汇点上，本届扬子江诗会通过回顾反思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发展道路，探讨诗歌应如何面向传统、时代和生活，体现真正的诗歌精神和时代精神。从这些层面上看，第三届扬子江诗会具有“总结性、反思性、时代性”的鲜明特征。

回顾与反思：新世纪诗歌的经典化可能

10月11日，第三届扬子江诗会的首场活动——大家讲坛在南京举行。本次论坛探讨新世纪诗歌发生了哪些变化，这20年又是否留下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文本。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吉狄马加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是个体写作，即诗人的写作一定融入了个体的生命经验，但诗人还是要追求一种人类的普遍价值，只有写出普遍性，才能找到更广泛的共鸣。

“新世纪诗歌”能否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是否能够算作一个独立的诗歌史分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认可这一划分，他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文化发生了明显转型：从制度文化角度来看，主流文学体制仍有影响，但文学亚体制不断成型并产生活力；诗歌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运动文化转为活动文化；印刷文化之外，网络诗歌愈益繁荣；网络文化环境下成长的“Z世代”，成为诗歌创作的主体之一。

由此也可隐约看出，新世纪的诗歌面貌实际上更趋个体化、分散化了。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个体化写作”是对此前集合性写作的反拨；从更大的背景来看，这又与经济文化多元纷呈的时代语境以及启蒙意识、群体意识的淡化等密切相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认为，上世纪90年代留下来的经典文本相对较多，而新世纪以来的



诗歌虽然也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文本，但要说完成性高的、无可挑剔的文本就少了一些。这与新世纪以来诗歌产量的急剧增长形成了对比。据《诗刊》副主编霍俊明介绍，目前诗歌网站注册人数达1000万，诗歌刊物达1100多种，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反思“个体化写作”的困境。

怎样才能实现对个体经验的上升和超越？河南大学教授耿占春分析了穆旦和海子两个诗人的例子：穆旦的特点在于他把时代经验、外部经验化为了他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并通过诗歌加以展现和描述。海子的创作依靠的是想象力的迸发和狂喜的瞬间涌现，他具有对不朽和美的深刻知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就此提出另一种思路，他认为，与新闻相比，文学必须面对和关注日常生活的神秘性，将这种天意和神秘揭示出来，才有可能诞生有分量的作家和作品。

反思新世纪诗歌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否定，问题的提出只是印证了诗歌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绝非简单的“天梯”式轨

迹可以概括，只有同时看到新诗发展进步的一面和回环的一面，才能有更清晰的认知和思考。

激活与嬗变：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投影

10月12日，新世纪20年中国诗歌创作研讨会在徐州召开。本场研讨以当下眼光审视新世纪诗歌创作，以期为今后的创作与研究提供启示。

新世纪20年来，中国诗歌的现场复杂多元。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汇，新媒体、新技术深刻影响着诗歌生态。在这一背景下，“诗歌传统”“新媒体”与“现代性”自然成为了本场研讨的三个关键词。《诗选刊》主编刘向东表示，新诗旧诗之间的墙在新世纪的创作中被打破了，新诗与旧诗本质上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罗麒麟认为，新诗并没有与传统古诗做真正的割裂，在诗歌精神层面，是有比较确凿的继承关系的。但诗歌处理的毕竟是当下经验，《十月》编辑部主任谷禾认

传统的投影及其当代化

□西 渡

别说它的当代性。到初期象征派，新“诗”逐渐成为诗人关心的中心，那些让诗成为诗的普遍的、永恒的东西，开始吸引诗人的注意力。最早关注到这个问题的是李金发，他说：“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稍为留意，便不敢否认，余于他们的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这是基于诗的普遍性，而试图调和中外。新月诗人同样基于诗的普遍性，而更关心融合古今。饶孟侃说：“诗根本没有新旧的分别，如其有分别，也只能勉强说是因为文字不同的关系，诗只有中外的分别。”（饶孟侃《再兴诗节的音节》）梁实秋也说：“诗并无新旧之分，只有中外可辨。”（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

废名则一反李金发和新月诸人的调和论，强调新诗与旧诗性质上的分别。废名在1934年11月发表于《人间世》第15期的《新诗问答》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观点：“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的”，“新诗”内容是诗，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废名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已经涉及诗的当代性的问题。废名要求新诗所表现的这个内容是“用文字来写出当下便已完全的一首诗”，而它必须是诗人当下的“实感”。与此相关，废名又有所谓古风的说法。废名批评沈尹默的《月》说，“比起旧诗来，这首诗好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然而，其高处，其非同时那些新诗所可及处，便在这个新诗有朝气，因此也是新诗的古风了”。废名所谓的“古”也就是“新”，是与诗的源头或旧诗的永恒性相接，同时也是传统本身的“当代性”。

在云端与大地之间：新媒体时代的诗歌生态

□卢 楨

种艺术形式。“云端”的诗歌写作改变了纸媒的传播方式，此外，它也对诗歌的主题模式、情感向度、诗义结构、审美形态等产生了显著影响。新媒体诗歌不仅属于技术美学的产物，还催生出一场诗歌符号文化的革命，而“超文本性”则是这些“赛博文本”的核心属性。在纸媒时代，诗人进行创作时无论是采取字意识、词意识还是句意识，其缘起点均未超出“字符”思维的范畴，而在新媒体时代，以简隽和含蓄著称的诗歌文体如果想要涵容更多的“此在”经验，就需要诗人有意识地将“意象”与“图像”贯通一体，在“字符”思维的基础上去探求符合新媒体时代特性的意象建构方式，为读者提供“通感”阅读的可能。当诗歌的审美内蕴（含蓄、朦胧、歧义）与网络的技术特征（跨界性和未完成性）相互贯通的时候，新媒体诗歌的审美内质便脱颖而出。

不过，负向效应也不应忽视，在三个方面需要警惕：一是“唯技术论”。一些写作者沉迷于无节制的技术狂欢，过度使用影音媒介，使读者空有一次性的阅读快感，却很难建构起文学性之美感。图像和声音在为诗歌拓展感觉效果的同时，它对文字书写的淡化和文学观念的泛化，很可能抽空诗歌审美的基础，从而遮蔽本属于诗的语义思维特质。因此，如何有效整合跨界经验与诗歌语言的复杂关系，让新媒体诗不游离于“诗”的属性，恐怕将是它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二是“虚假及物”。在娱乐文化的浪潮中，部分诗人秉持一种通俗实用的、迎合感性现代性的审美倾向，将大众文化对“物”的关注作为审美基点，强调个体的感官经验和欲望的合理性，从见证者和体验者的双重层面抒写生活现实，这正应和了流行文化即时性、消费化、符号化的特点。然而，新媒体诗歌众

为写作者要具有创新意识。扬州大学教授叶楠则提出，或许根本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抒情方式。大量的古代经典诗歌是应答互赠式的、生活化的，具有具体化的生活情感，这为抒发当下生活和情感提供了参照。《诗歌月刊》主编李云认为，现代性对美学思想、对文学的创作研究在任何时期都很重要。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张执浩认为，诗歌的精神走向是有高低的，他更倾向于对生命进行书写，“以前我喜欢写日常生活，现在我觉得写日常生活可能还不够，文学提出了更高的命题——生命的意义”。

展望与祝福：以诗的语言抵达时代的精神深处

11月8日，“情满小康路”诗歌朗诵会在徐州丰县上演。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和部分机关干部、江苏省委驻丰县帮扶工作队队员、当地文学爱好者和师生代表等300余人观看了诗歌朗诵会。

为回顾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讴歌小康建设的伟大成就，江苏作协发起“大道之行——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全国征稿活动，鼓励诗人用手中的纸笔记录时代的悲欢。活动共征集诗歌稿件千余首，从中精选了9首诗歌在诗会上朗诵——《春光正好》演绎的是高铁速度，也是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扶贫队员之歌》娓娓讲述自己的初心与渴望；《富矿》是奋斗者的精神图谱；《老宅行》是一个老人告别老宅、走向未来的临别絮语；《金蝉》《擦亮眼睛的两个字》《说好的》饱含着诗人对生活过、奋斗过的土地的深切情感；《笑容》《在金色里感受幸福》洋溢着苦尽甘来的丰收喜悦。这些诗歌，凝视生活与时代的目光是真诚而热烈的，它们勾勒了悠长历史的轮廓，记录着迈向小康的步伐，是生活着、奋斗着的人的心声和呼喊。而这正契合了扬子江诗会孜孜以求的目标：关注时代发展变化，介入诗歌创作现场，以诗的语言抵达时代的精神深处。

（周 楹 俞丽云）

从内部生成视角看诗的『现代性』

在『第二届扬子江诗会·徐州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唐晓渡

有关“现代性”的研究和争论由来已久，相关的文章、专著已然汗牛充栋。其中的一些洞见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前提是同样不要忘记把它们放进现象学意义上的括号。比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这句断语：“现代性反叛传统的标准化机制。现代性依靠的是反叛所有标准的东西的经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判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被视为辨识和认知现代性的出发点。不过，相比之下，墨西哥诗人、思想家奥·帕斯的如下观点似乎更值得关注：“现代性，以批判为基础，自然分泌出对自身的批判。诗歌是这种批判最有力、最生动的表现之一。”这里帕斯不仅从逻辑上揭示了两种现代性，即社会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分野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从根本上点破了诗歌现代性的本质。据此可以认为，现代诗存在的理由，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执行现代性自我批判的使命。

作为长期关注现代性问题的诗歌工作者，我愿借此再次向伟大的帕斯致敬。我曾说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从他有限的论述中获得的教益，比另一些大部头的著作加起来还要多。而说得更恳切，并随着一个人的阅历渐深而越益显示出其澄明的真理性的，是他的另一段“夫子自道”：“在寻求现代性的漫长旅程中，我曾多次迷失，又多次迷途知返。我回到原地，发现现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们内部。它是今天，也是最古老的古代；它是明天，也是世界之初。它生活了千年，但又是刚刚诞生。”“真实性”也意味着普适性；而普适性，在这里首先意味着某种共通的隐痛。对现代性的追寻伴随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它深刻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图像，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人们感受、认知事物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带来了众多变化和生长，但也带来了更多的冲突、迷乱和令人尴尬的困境。困难不在于是将现代性视为一份“来自西方的礼物”抑或挑战，而在于如何将所有这些连皮带骨地消化掉。由此，在我看来只有像帕斯所说的那样，“回到原地，发现现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们内部”，才算真正勘破了“现代性”的秘密。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厘清社会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同构异质”的辩证关系，而且直接打破乃至取消了这一问题

上包括“原生”和“次生”在内的诸多二元对立，使种种因“心智殖民”而导致的矮人一头，唯恐“落后”的疑惧和焦虑再无容身之地；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性“变之潮流”持续加速度的情势下，基于诗所独有的时空观，再次申明诗之所以作为诗、成为诗的不变自性。当然，“原地”在这里所指陈的，远不止是某一人文地理坐标。说“回到原地”，首先就是说回到诗寻求创造的本性，回到母语诗歌和每一个诗人所面临的特定“问题情境”，回到构成这一情境的种种矛盾冲突，并在内外博弈和自我生成中坚持出诗无可替代的声音。那是回荡在变革和保守之间的“另一个声音”，是激情与幻变的声音，是打通记忆和遗忘，使曾经、正在和即将到来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世界结为一体的声音，是既属于古代又属于当下即刻，无所谓日期的声音。就此而言，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从根本上，而不只是局限于特定题材、思想或情绪的反现代的声音，因为它们不仅比历史变化更古老而且后者无法渗透”。同样就此而言，“反现代”不仅从来就是诗之“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正是它的本义。

过去三年中我们一直在纪念新诗100周年。这与其说是一种因界定日期的标尺不同而导致的混乱，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一场不得不超出常规、一再延宕的内心仪式。回顾新诗百年的历程，反思中国“问题情境”中的现代性问题，会有一种乘过山车的晕眩感。这种晕眩感既来自急速切换的历史变化，也来自过于复杂且落差巨大，最终悲/喜剧混合不分的心情转换。五四以来的几代诗人都置身其各自不同的“问题情境”并试图做出各自的应对，其中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惨痛的教训，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被后来者作为遗产简单地继承或抛弃。时至今日我们能看得足够清楚：新诗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更多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新诗如何接受和消化西方种种现代思潮影响的问题，而是一个诗歌写作如何据其创造的本性，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博弈及其造成的常变常新的历史语境中，包括其致命的悖谬中，不断“成为现代”并发现自身的问题。在此上下文中不妨说它既是诗人们头顶的星空，也是他内心的道德律，它不倦地以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方式启示我们紧紧抓住并全力拓展那些鲜活的原发经验和动机，那些瞬间呈现的真实和正义。它的教导和规划始终如一，那就是：专注于生命个体的自由创造，专注于母语诗歌敞向可能性的自我生成，而永恒的现代性自在其中。

现代性作为当代诗歌复兴的问题情境，其自我生成的意涵较之此前远为复杂。这种复杂性既对称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性矛盾冲突及其加速度的演变，又对称于不断扩大的全球化语境中外来影响的时空错位，包括翻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还对称于我们基于新的多元格局对新诗历程，包括其与古典传统关系的反思。所有这些作为当代诗歌的图像和声音之源，其在彼此投射、抵牾或呼应中形成的叠映和交响，本身就具有“异质混成”的性质。由此，我们更应该着力探讨的，或许是更能反映当代汉语诗歌特质的某种“复合的现代性”。